

“评论湘军”的理论胆识

——评王福湘《悲壮的历程：中国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史》

楚雁

(中南大学文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3)

摘要: 王福湘《悲壮的历程：中国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史》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为学术精神，治学态度；二为心灵选择，方法定位；三为思想目标，文化追求；四为学理解读，历史对照。该书以宏大的手笔，学理探索的形态，展现了中国新文学运动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画卷，坚持了认识与反思历史的学术性、科学性、准确性和客观性的追求。

关键词: 王福湘；学术精神；心灵选择；文化追求；历史观照；客观性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3)01-0141-04

在两个世纪之交的中国学坛上，把这样一部著作奉献给世人的，是昔日“评论湘军”中的骁将王福湘教授。王福湘教授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里，同不少湖湘作家、学人一样，“为了得到一块生存的空间，我不得已离乡背井”，移居风景秀丽的广东肇庆。而现在，他是在“遥远的南国”向我们传递他的生命信息。尽管忆及“评论湘军”当年的熠熠风华，不禁令人有恍若隔世之感，但这部写于“他乡”的学术著作本身给予我们的鼓舞，仍然是亲切和温暖的。我知道，即便是在学术本身也被“操作”的今天，仍然有不少视学问为生命的好学者，在新、旧体制相互重叠、交合、共谋、呼应的区域之外，亦即所谓边缘地带，辛勤而艰难地劳作着。但王福湘教授作为“湘人”，却自有其展示“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湖湘文化精神传统的独特方式。依我看，除了“这样”的题目，“这样”的内容之外，恐怕此中最为可贵的人文品格，是于中所显现出来的锐利与执着；而且他“明目张胆”，不惧其左右均不逢源的窘境和苦况，公开地、响亮地、一如既往地、无怨无悔地喊出自己的声音——读一读该书的《白序》，内中的柔韧与刚强，的确不能不给人以“悲壮”之感：这实在是不寻常的一段“历程”。

20多年以前，他就开始了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虽然很不容易，但我觉得，彼时的王福湘之所作为，所显示的主要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文共性，因

为那时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口号下，敢于高举思想解放大旗，英勇地冲破理论禁区者，真的不是一个小数目。而王福湘那时所做的这一题目本身，说实在的，也的确为相当多的有识之士所共同关注。他尽管有自己的独见，但在“百家争鸣”的热烈而昂扬的学术氛围中，是并不显得格外突出的。也许我更为敬重和珍惜的，恰恰是他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作为。在《白序》中，他劈头就说：“终于开笔写这本书了”；又说：“写这本书的念头是在十年前萌发的。风云变幻，可歌可泣，使几代中国知识分子中那些富于良知而又过于天真的人再度陷入沉思。我就是其中的一个。”他通过“进一步的思考”，对“革命现实主义”产生了困惑，认为有必要对一向被尊为中国新文学主流的“革命现实主义”的历史进行系统的清理。他说：“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自我的反思，因为我曾经是‘新时期文学’和‘革命现实主义’的积极鼓吹者。”联系到《白序》末尾他所说的如下一番话，即“我深知写这本书的准备工作很不充分，而且还不太合时宜。但我没有条件掌握丰富的原始史料，也不可能等到时机完全成熟再动笔。我的能力有限，只能做我力所能及的事。我的时间不多了，必须抓紧做、拼命做才行。这将是我一生的学术总结，不管它怎样丑陋，甚至残缺不全，也要趁我还活着的时候把它交出来。”我觉得，也许王福湘教

授作为湖湘知识分子的人文个性,亦即其精神生命、文化生命之精髓,正好集中地体现在这一本被他视为“我一生的学术总结”的书里了。

王福湘教授及其著作的宝贵价值究竟在哪里?照我看,一在学术精神,治学态度;二在心灵选择,方法定位;三在思想目标,文化追求;四在学理解读,历史观照。

诚如其所言,20年里,“关于这个课题的思索则一直没有停止”,哪怕同时、先后面临学界的打压、生存的困境、同行的误解和处境的落寞。在20世纪80年代,左风横吹不算反常,在当时良好的学术氛围里,也构不成对正直学者的实际威胁。但恰恰是在这种学术氛围里,一些表现在“好”学者身上的不良乃至危险倾向,却犹如暖春里滋生的病菌一样,悄悄地疯长于美丽如画的学苑当中。其中也许谁都不曾留意因而也就不以为意的恶习是:这些人有时在以我对王福湘教授的了解,我深知他是一个做老实事的人:做人如此,做文亦如此。在他的心目中,也许事无新旧之别,但却有对错、好坏、真假、善恶、美丑、高下之分。做学术工作,从选题、命意到内容、形式,“旧”(或“传统”)是无须拒斥的,“新”(或“现代”)也就不见得好。关键在于实在、严谨、精细、深入,正确与深刻是第一位的,不必刻意讲求新鲜与时髦。最重要的是要有“问题”,发现之,研究之,剖析之,解答之,能力有限、力有不逮甚至怎样“丑陋”和“残缺不全”以及错误都无碍,可贵的是做,“必须抓紧做、拼命做才行”。人所不屑为者,只要应为、能为,我必为之。这是他作为湖湘学者的心灵与行为选择。在方法上,我欣喜地发现,他所钟情的学术路数,竟与这些年来我所心仪的“范式”、预设的“轨道”几乎完全一致。比如说,他所倡行的第一原则是“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出发”。此虽非新鲜物,但却在几乎整个20世纪90年代中,被“新潮”“前卫”“先锋”“晚生”学人们忘却、抛弃得差不多干干净净了。他们酷爱“自我表现”,尤喜“以意为之”,崇尚“张扬个性”,鄙夷“按部就班”,誓做“行空”的“天马”,实为“无根”的“浮萍”。其笔下泡沫成堆,尽管五彩缤纷,令人眼花缭乱,但却转瞬爆裂,犹如过眼烟云。但王福湘教授积20年之心血而做成的该书,却字字有来历,句句到实处,看上去灰扑扑的,掂量起来却沉甸甸的,使人倍感厚重。再比如,他立意要写出“一种特殊的充满矛盾的思潮史”,却又“重在探讨文人的心灵而非文本”,同时断然“拒绝‘零度感情’和‘纯学术’的说教”。这些主张或举措,自然应当与他对“历史进行系统的清理”并自觉地以“自我的反思”为前提等意愿比照起来看。尽管这些心灵的选择和方法的定

位,一则未必尽善尽美(比如,轻文本未必是正确的选择),二则未必完全落实了(此中有主观的和客观的局限),但我认为,至少在“当下”,它们都是极具针对性,很有现实感,敢于独标高格,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所谓要写出“一种特殊的充满矛盾的思潮史”,恐怕尚不仅仅只是一个注重并掌握了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及其方法论的问题,它同时还是对近10年来学风的浮躁、轻佻、骄狂,以及与之相关或随之而来的对历史与现实认识的偏颇、浅薄、蒙昧的现状的挑战与批判。在所谓“市场化”“全球化”“现代化”的美丽词藻掩饰下,“文人的心灵”的堕落早已路人皆知,从某种意义上说,如今某些“知识分子”言语、行为、精神、灵魂的丑陋与腐朽,比起被他们所轻蔑和鄙夷的整整几代前辈知识分子,那真是“胜出”不知道有多少倍!然而正是他们,越来越以洋洋得意的“舍我其谁”的“今日才了”身份,指点现实,否定历史,宣称要“与父亲断乳”,创造自己虚无缥缈的、光明无比的、崭新的“黄金时代”和“黄金世界”。王福湘教授当然不是,也无意于做这样的“弄潮儿”和“宁馨儿”,他只想用自己“传统”的理想与激情,以及经过了“新时期”思想解放与文化更新洗礼的学术信仰与操守,扎扎实实地以一个无名小卒的身份,做一点有益于民族、时代、社会、文化、文学和学术亦即世道人心的小事情。所以,他对于所谓“零度感情”和“纯学术”的说教,只能并且必然采取拒绝的态度。

正是这样的态度决定了他在写作该书时的思想目标和文化追求。但当然,这种态度亦即心灵选择和方法定位,又正是其思想目标和文化追求的有机组成部分。该书以宏大的手笔,学理探寻的形态,展现了中国新文学运动将近一个世纪的色彩斑斓但又令人百感交集的历史画卷。仅仅只是面对这一画卷都已经殊不容易,而审读这一画卷,自然更令人感叹唏嘘。但今天的中国就是从这一历史画卷中脱胎而来的。作为新生儿,在今天的时代,对自己的母体,在思想上、文化上做何认识决不是小事情,更不是可以回避的问题。我注意到,在力图正确、精到并且深刻地把握这一宏大的历史画卷背后的思想、文化底蕴及其精神乃至道德真谛的时候,有些重要的话语和关键词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如“坚持和发展鲁迅所开创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走民族的开放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路”。王福湘教授以这样的思想主旨来提起其对于“中国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史”的宏大叙述,我以为其中最为重要的主体信息之一,便是于此中透露出了,他在自己的学者生涯中所业已牢固地确立了的的文化观念。应当说业已确立了此种文化观念的“几代中国知识分子中那些富有良知而

又过于天真”，但在经过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中的痛苦反思之后不再“过于天真”的人，不是一个小数目。而这些人之所以既热爱、珍惜今天的时代，但又与其“后辈”即上述那些“新潮”“前卫”“先锋”“晚生”学人们，在很多学术问题特别是对待历史与现实的基本态度上，认识与行为往往很不一致，可能正与此有关。这是一些无论就其经历还是阅历来说，其丰富性与复杂性都远非其“后辈”可以望尘的人们。惟其如此，在能够充分而又透彻地认识至少是察知历史与现实本身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的同时，他们自身的认识在越过了相应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之后，在思想上、文化上可能又回归到了“天真”与“单纯”的境界。他们以后者来驾驭前者，力图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完成对“历史进行系统的清理”，和在此之前或同时做好“自我的反思”这两项工作，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本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或“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其“后辈”们，恐怕迄今为止还远远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甚至连相应的迹象都还渺无踪影。在绝大多数后者的心中或学术辞典上，都不可能拥有像王福湘教授在其《悲壮的历程》中所容纳的那么丰富和复杂的历史内容及其影像。自然也就不可能像王福湘教授所做的这样，把像“‘五四’遗业”“鲁迅传统”这类术语视为这般神圣、庄严和伟岸，并以之作为关键词，串连起诸如苏俄、左联，尤其是胡风、周扬、舒芜、丁玲、王实味、冯雪峰、桑伟川、张志新、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夏衍、赵丹、胡乔木等“团体意象”和“人物意象”，编织出一个巨大的，既错综复杂、盘根错节，又单纯明晰、一目了然的文化网络和思想纽带，借以透视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革命现实主义”的本质，以及其深远的政治影响和审美遗传的真相。也许，在把“文艺一政治”纳入专注、深沉的学术视野的同时，该书以“革命现实主义”一语来包罗万象且等同视之，一则过泛，二则失准，三则有命题本身被自我解构之险，四则又因其“省略”或“忽略”（文本与“其他”文学现象）而有孤立和简单化之嫌。但是，作为一部“中国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史”，一部20世纪中国文艺一政治运动的“准百科全书”，不但其认识价值是“非凡”的；而且，在其《代结语——20世纪中国文学运动中的革命现实主义》中，所得出的“革命现实主义主流地位的必然终结”，又“还远没有到灭亡的时刻，它还保有强大的生命力量。只要适宜的社会历史条件没有消失，它就没有过时”这样的结论，其内涵无疑是相当厚重而又富于悲怆感的。他说：“和伟大鲁迅的名字连在一起的革命现实主义的主流地位必将因全国经济及文化教育的巨大进步而告终结。鲁迅精神永

远不朽，鲁迅永远是中国现代优秀知识分子的楷模，但鲁迅时代确乎已经过去，鲁迅般的巨人似也不会再生。这恰为马克思发现的经济与文学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提供了新的例证。”但是，历史将怎样回应其预言式的论断呢？

在我看来，王福湘教授的这部大作完全可以在某种特定的意义上视为学术操作的范本。这不仅指文本“内”，而且指文本“外”。我对该书操作的某些技术性层面上的问题有着自己的不同意见，我也不是完全同意作者的“20世纪中国文学整体观”中的某些基本乃至重要的环节。比如说“20世纪中国的革命现实主义创始于五四时期”，“五四新文学运动是中国革命现实主义的发端”，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中“已包孕了革命现实主义的理论胚芽”，而“真正显示出文学革命实绩并形成革命文学传统的，是以鲁迅为代表的全新的小说和杂感”，其“结集在《呐喊》《彷徨》中的小说却以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实实在在地为中国新文学的革命现实主义开创了极其宝贵的传统”等，总让人觉得其中的关键词如“五四”尤其是“革命”，含义不是很明确，既有点模糊又前后不相一致。类似的情形当然还有。但是通观全书之后，我还是觉得，这些看似重要的纰漏其实又不太重要了。因为，第一，整部书的学术操作的确是很严谨的，不但学理脉络清晰，而且逻辑感非常强，实际上其说服力并不滞留于单个的观点或局部的阐释上，而恰恰是建构在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宏观把握之上的。所以，其深度感与力度感是隐在的，具体地说，我以为最为成功之处是在材料、组织及其所形成的文本结构这三方面。联系我以往对王福湘教授研究工作的印象，这恰好是他一以贯之的特点与所长。简而言之，他是追求并擅长于以事实说话，重展露而不重思辩，虽无外显的风采，但学术基点相当厚实牢靠，所以给予读者的触动或感动特别地内在。第二，除本文前述的诸多好处之外，该书难能可贵之处还在于：1) 它同时冲击着并力图拨正历史的和学术的两个误区，而后者又恰恰是在对前者的反思中发生的，所以又有着尤为重要的意义和隽永的启迪。其实历史上的误区，历史上的人，一代又一代，总是力图走出来。但为什么又几乎总是走不出来？恐怕其根子就在于这作为走出的前提的反思有问题，或者是矫枉过正，或者是以一种错误的倾向取代了另一种错误的倾向，但最终总是重蹈覆辙。不能说王福湘教授的尝试已臻完美，但他的有针对性的努力却很有价值。2) 在具体的操作上，它又同时揭示并力图解释革命和现实主义的两个厄运，而在20世纪的中国，这二者又恰恰是相互夹缠不清，难解难分的。

“革命”当然不一定与“现实主义”之间有着宿命般的必然的联系。但在20世纪的中国,“革命现实主义”的文学思潮作为在特定的国情、民情、社情、世情下应运而生、横空出世的巨大怪物,以其“历史的强蛮”将二者不由分说地糅合在一起,却也是一个无法逃避和不可回避的文化现实。不幸的是辉煌之后,厄运降临,这种文化遭际和命运中的“无常”现象,当然不能用文化宿命论去一言以蔽之。而王福湘教授却

敢于破除学界中的世俗性偏见,独嚼苦果,独啃坚果,果然掀开了历史铁幕之一角。3) 它提供了关于“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一个新的文化阐释和学理解读之生动的例证。除了文本自身的力量之外,它还以其显目的倔犟提醒人们:在试图解答现实问题之时,历史的观照其实正是最迫切的当务之急。而正确认识历史的基本要求则是学术性、科学性、准确性,而统摄这三者的则应是客观性。

Theoretical courage and insight of the critics in Hunan

CHU Ya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The value of the book by Wang Fuxiang “Solemn and stirring course: the historical trend of revolutionary realistic literature in China” is mainly embodi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the academic spirit and attitude, the choice of spirit and the orientation of method, the target of idea and the culture pursuing, and the doctrinal explanation and the reflection on history. This book describes the new literary campaign in a century. The author insists on pursuing the technicality, scientificity, veracity, objectivity in understanding and introspecting history.

Key words: Wang Fuxiang; the academic spirit; the choice of spirit; the culture pursuing; the reflection of history; objectivity